

徐 新 主 编

现代希伯来小说选

ANTHOLOGY OF MODERN
HEBREW SHORT STORIES

קובץ ספורים
עבריים
בני זמננו

AN ANTHOLOGY
OF
MODERN HEBREW SHORT STORIES

现代希伯来小说选

徐 新 主编

(桂)新登字03号

现代希伯来小说选

徐 新 主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2.125 插页2 字数261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ISBN 7—5407—0897—1/I·636

定价: 5.65元

序

徐 新

众所周知，具有和中华民族一样悠久历史的犹太民族曾在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学。以《圣经》为代表的古典希伯来文学被公认为人类古代文学的巅峰，这一“世界上最幽邃神奇而富于魅力”^①的文学不仅是古代犹太民族的骄傲，也是该民族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历来受到各国人民的珍视。然而，由于犹太人的特殊历史遭遇，希伯来文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出现了衰颓、沉寂。18世纪启蒙运动在欧洲的兴起，给犹太民族以极大的影响，以东欧犹太人为主体的犹太民族在文学领域表现出了新的活力，他们采用犹太民族在流散时创造出的意第绪语写下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而开创了一场被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称之为“新犹太文学”^②的文学运动，为世人所瞩目。

不过，希伯来文学并没有因意第绪语文学的兴起和繁荣

① 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② 沈雁冰：《新犹太文学概观》，《小说月报》，1921年，第十二卷第十号，第60页。

而消亡，相反，随着犹太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认为使用有悠久历史的希伯来语进行创作是保持犹太文化一以贯之的一个重要方面，犹太文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纷纷开始使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特别是在希伯来语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得到“复活”后，希伯来文学更是得到了发展，终于形成了人们称之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文学新潮。今天，现代希伯来文学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民族文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和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优秀作家，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注意和重视。

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华民族对于古典希伯来文学和意第绪文学并不陌生。在基督教传入我国的同时，以《圣经》为代表的古典希伯来文学就被介绍给了中国人民。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对古典希伯来文学有过相当高的评价，说它“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以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未艾。”^①

意第绪文学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时，由于相当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先驱的努力，也被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茅盾、胡愈之等著名文学家不仅撰文评论意第绪文学的长短得失，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翻译介绍了相当数量的意第绪语作品。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小小的“犹太文学热”。现在回忆起来，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中犹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已有一百年历史的现代希伯来文学却基本没有介绍到中国来，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卷，第64页。

少有的一个“空白点”，致使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读书界至今对它仍感到生疏。在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的今天，研究和介绍现代希伯来文学显然已经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出版界所面临的一项迫切而有意义的任务。《现代希伯来小说选》的选编和翻译就是这一努力的开端。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开端可追溯到两百多年前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以前，希伯来语一直被犹太人视为圣语，主要在与宗教有关的活动中使用，例如用在研读《圣经》、《塔木德》等圣书上，在犹太会堂中举行宗教仪式上，在撰写宗教哲学书籍上，在处理世俗问题上则很少使用。

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犹太作家开始用希伯来语进行非宗教文学的创作，一大批世俗作品开始出现。由于现代希伯来文学从一开始就是犹太人世俗文化复兴的一种标志，因而常常被一些正统犹太教徒指责为对圣语的“亵渎”，是文化上的离经叛道行为。

不过，早期出现的现代希伯来文学，除了诗歌以外，大部分不是非小说，就是以小说形式出现的说教作品，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此外，尽管它所使用的是希伯来语，然而，却是二千年前犹太人所使用的圣经希伯来文。由于犹太民族的独特历史，被人们称之为“圣经希伯来文”的语言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自公元70年罗马帝国用武力消灭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犹太人开始流散四海以来，希伯来语便遭到了厄运，逐渐丧失作为犹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沟通和交际的工具的功能，因而被人们称为“死亡”的语言。尽管它不像中东地区其他一些古老语言如腓利斯丁

语、埃多米特语那样从人类语言舞台上彻底消失，但到了18世纪，它已基本上成为一种“书面”文字。它所拥有的8000左右的词汇量是没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用这样的语言来进行新的文学创作显然已经捉襟见肘，难以写出真正反映现代人思想和社会的作品来。

不过，以对其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笃信和固守著称的犹太民族对其语言的眷恋也是执着的，当19世纪犹太复兴运动开始兴起时，这种对本民族语言的执着眷恋导致了一场“希伯来语的复活”运动，在后来被誉为“现代希伯来语之父”的埃利泽·本·耶胡达带领下，在短短的几十年之间，这种“死亡了”近1700年的语言终于复活，为数以万计的人民所接受，成为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日常使用的一种真正的语言。犹太人祖先创造出的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语言终于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进入了现代语言的范畴。希伯来语的复活不仅表现了犹太民族的再生能力，成为犹太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还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出现和繁荣奠定了语言基础。

本文在这里用一定篇幅谈论希伯来语的历史，主要是因为它涉及到对现代希伯来文学肇始年代的界定。人们目前在谈论现代希伯来文学时，主要是指希伯来语复活以后犹太民族用现代希伯来语进行创作的文学。如果我们把本·耶胡达携妻来到巴勒斯坦，决定除非使用希伯来语，否则彼此之间不进行语言交流的1881年看作现代希伯来语的开端，那么，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发端就应该大致定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鉴于笔者倾向这一观点，本小说选的选材范围也就自然限于这一时期以来的作品，而不包括这一时期以前的任何

作品。

如果我们同意以现代希伯来语的复活作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起点，那么，现代希伯来文学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现代以色列建立前时期和建立后时期。以现代以色列的建立作为自然分野，是因为现代以色列的建立使得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现代以色列的建立使现代希伯来文学成为一个主权民族的文学，从而为文学走向繁荣开辟了道路；二、在现代以色列建立后，由于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能够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移入这块犹太人祖先牧过羊、立过国的故乡，以及以法律形式规定希伯来语为官方用语，使得现代希伯来文学第一次拥有规模较大的真正读者群。文学终于找到它的归宿，接下来，便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和繁荣。

现代以色列建立前时期 这一时期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特点是文学与犹太民族的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兴起于19世纪末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看一下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约瑟夫·海姆·布伦纳（1881—1921）、希其尔·尤瑟夫·阿格农（1888—1970）、德沃拉·巴农（1887—1956）、格松·肖夫曼（1880—1970）、亚可夫·斯坦伯格（1887—1947）、海姆·哈扎斯（1898—1973）等人的生平，便可以看出他们全部都出生在欧洲，都是投身于当时正在蓬勃展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是抱着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的理想告别自己的出生地，来到巴勒斯坦的。在他们看来，文学应该首先为犹太民族的振兴服务。为了服务于这一事业，这些在欧洲出生并长大的第一代现代希伯来作家都毅然决然地丢开各自熟悉

的意第绪语、德语或其他语言，坚持用刚刚复活的现代希伯来语从事创作。对于这些作家来说，采用现代希伯来语进行创作便意味着除了面对掌握一种新语言的困难，还面临着读者对象的变化。因为，即使到现代以色列建立前夕的1948年，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写作对象的人数也没有超过50万人，而它的实际读者要比这个数字少得多。然而，在他们看来，单单是采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一事就已经表明他们是在为民族的振兴服务了。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完全可以说，现代希伯来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民族复兴运动的标志。

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试图回答“做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命题，而不是去探讨“做人的意义”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创作命题。现代希伯来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上的自我意识无疑是一种民族观念的自然表露。中国社科院王逢振先生在一次文学讨论会^①上曾指出：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后期，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想象文学的形式和主题密不可分。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任务指引着文学的进程，它通过“民间人物”和“民族语言”的浪漫主义概念，把文学导向独特的“民族文学”，另一方面，文学也通过自己的形式——作品，参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事实上，只要看一下当时的文学就会发现现代希伯来文学确实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参与了现代以色列的形成。

现代以色列建立后时期 前面已经提到现代以色列的建立使得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彻底改变了

^① 指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等单位于1990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文学的传统与创新”讨论会。

长期依靠相对来说很少的团体支撑的局面，一批批新作家涌现，文学开始进入发展和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的文学首先为“国家文学”服务，一大批直接描写以色列犹太人生活和精神风貌的作品问世，犹太人继《圣经》文学之后再一次以主权民族身份出现在作品中。无论从什么角度，人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民族自豪感。

对这一时期的作家而言，他们并没有因为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社会、新的人民、新的生活方式而落入站起来的民族的自我陶醉的陷阱，也没有开创浅薄、莺歌燕舞式的颂扬之风，而是以敏锐的目光、冷静的思考、洗练的笔触大胆地揭示生活的本质，把人们深藏心底的感受挑到意识的表层。作家笔下那一部部表现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内心的思索、探求、怀疑、忧戚、痛苦、烦恼和迷惘的作品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反映着生活和社会，具有艺术的深沉和厚实。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是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这一时期的文学还表现出希望走向世界的倾向，这一点在60年代闯入文坛的作家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一代青年作家无一例外，都以代表在巴勒斯坦出生和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自居，这实际上也是以色列新一代思想意识和世界观的体现。同他们的前辈不同，这一代人最主要的社会经历是现代以色列的建立，西奈战争和1967年的六日战争。为了走向世界，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现代主义结合，而青年一代作家对来自西方的所谓新思想、新观念以及艺术表现形式十分敏感，接受能力也很强。在他们的推动下，出现了相当一批打上印象派、荒诞派、存

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记的作品，并很快成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主流。

现代以色列建立后新一代作家的崛起，还使以色列文坛出现了一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少见的反常现象，在创作风格上不是老一代影响新一代，而是新一代影响老一代。正如以色列文学评论家格森·谢克德所说：“第二代〔作家〕对第一代〔作家〕的影响远远超过第一代对第二代的影响。”^①

现代希伯来文学从诞生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尽管它在艺术上还显得不十分成熟，作品的力度还不够厚实，所揭示的生活也还缺乏应有的深度，但它毕竟走过了起步阶段，经历了发展过程，开始向繁荣时期步入。它的优秀代表不仅获得像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世界性文学大奖，而且为各国人民所喜爱。作家兼文学评论家詹姆斯·米切纳曾对它作过这样的评述：“也许它（指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文学色彩还比不上法国文学，政治附属性还不及苏联文学，手法精巧的程度还不如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作品的容量还抵不上最好的美国文学，但它的活力却比这些文学中的任何一个都强。”^②凡熟悉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人都会感到米切纳的这一看法显然是很有见地的。

本小说选收录的20位作家分别是现代希伯来文学各个不同时期的著名人物，有一定的代表性。所录的作品从内容上讲大致包括以下两方面：以描写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迫

① 格森·谢克德：《过去四十年希伯来小说浪潮》，《现代希伯来文学》，1988年第1期，第5页。

② 引自《第一批果实——以色列文学25年集锦》前言，福西特出版社，康涅狄格州，1973年版，第23页。

害、遭屠杀的受难题材为主的作品和以反映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题材为主的作品。

在世界各民族当中，也许再也没有其他一个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在历史上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歧视和迫害，撇开罗马人的屠杀、十字军的迫害、西班牙的驱逐等事件不谈，单从19世纪末到希特勒纳粹时期犹太人遭迫害、被屠杀的一系列事件看，犹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就够惊心动魄了。因此，对于现代希伯来语作家来说，描写受迫害的犹太人的悲惨生活就是一个写不尽的主题，创作震撼人心的受难文学成了一个传统。阿格农的《女主人和小贩》、斯坦伯格的《瞎眼女》、阿佩费尔德的《基蒂》、肖夫曼的《安娜》、奥利伍的《排头兵》、托默的《桃、李和面包之邦》、哈雷文的《曙光》就是这样一批描写犹太民族受难历史的作品。

《女主人和小贩》以一则寓言体裁的故事反映了犹太人生活在邪恶吃人的世界之中。故事中的女主人很像美国犹太作家辛格小说中专司迫害的魔鬼，在迫害着犹太小贩。专以吸人血而生的女主人表面上对小贩很好，实际上是为了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小说中通过对女主人“在胸口划了个十字”的描写，暗示女主人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一种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的迫害。

《瞎眼女》是一篇主要反映犹太人不幸生活的小说。主人公查娜是个瞎子，在婚姻上不仅受到媒人的欺骗，还受到母亲的欺骗、丈夫的欺骗。被说成是烟草商的丈夫，实际上是个看墓地的人。过着这种受所有人愚弄的生活的瞎眼女当然已毫无幸福可言。亲骨肉的病倒和夭折以及她在墓地察觉到他们生活的环境时发出的令人心碎的惨烈叫喊，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犹太人的不幸历史。

《基蒂》则通过一个犹太女子的不幸遭遇，控诉了二次大战中基督教对犹太民族的迫害。犹太女基蒂在父母双亡之后被带入修道院（基督教社会的象征），接受基督教的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改宗迫害，使人们想起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在欧洲大陆上发起的一起起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迫害，特别是西班牙几十万犹太人被迫改宗的一页。那些迫于压力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骨子里仍然遵守犹太教义和礼仪，以坚韧的意志保持自己的信仰。基蒂的内心活动表明，尽管她无力作出实际的反抗，但她是坚决反对改宗教育的。在改宗目的不能达到后，修女院终于撕下了含情脉脉的仁爱面纱。作品结尾有这么一句话：“修道院几乎是在恳求〔德国〕士兵开拔进来”，无疑是神来之笔。修道院玩弄的这种借刀杀人的“游戏”，在向人们揭示宗教迫害的残酷的同时，也诉说了犹太民族的不幸。

在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中，最悲惨、最令人发指的要数希特勒法西斯对犹太人犯下的种种暴行。《安娜》篇幅虽短，但在控诉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罪行上仍是强有力的。作者借用电影的剪辑手法，在两千来字的故事中描写了一个天真活泼、像“正要展翅飞向远方的蝴蝶”的犹太小姑娘所遭受的扼杀。对关押犹太人集中营的非人生活，作者没有浓墨渲染，只是写了蓬头垢面的人脸、眼中流露出的不安神情、以及当问及小安娜在哪里时，“在忙着”三个字的简短回答，由于作者高超的剪辑手法，这短短的几行字却把集中营对犹太人的迫害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排头兵》是另一篇控诉法西斯暴行的作品。这则反映

两个为了躲避德国法西斯迫害而隐姓埋名在阁楼斗室中藏身立命的孩子的故事，不禁使人联想到犹太少女安娜·富兰克和她的著名日记，他们的不幸无疑是千千万万个在德国法西斯白色恐怖下犹太人悲惨处境的真实写照。

以表现犹太人受迫害为主题的《桃、李和面包之邦》开头所展示的犹太人为迁徙而长途旅行的场景，使人们联想到了自19世纪末以来东欧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犹太人移民浪潮，隐藏在这一系列移民浪潮背后的是东欧各国特别是沙皇俄国对犹太人实行的有组织的集体迫害。本篇故事中犹太人的形象已不同于其他故事中的犹太人，人们看到的已不再是逆来顺受的羔羊，与迫害者同归于尽的举动表明了犹太民族的反抗精神。

《曙光》是一篇控诉法西斯屠杀罪行的作品。作者采用的超现实手法使得作品容量增大。一个没有阳光的世界象征犹太人所生活过的欧洲社会的黑暗，德国士兵对主人公故乡反复采取的所谓大锅行动，实际上是一种灭绝种族的屠杀。作品中对大多数被害者在迫害临头时表现出的麻木不仁状态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犹太人在迫害来临时的真实状态。

现代希伯来文学作为主要反映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文学，自然会从各个方面反映那里的社会、自然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状态。本小说选收集的布伦纳的《出路》、巴农的《夏末》、贝拉克的《哈依井》、塔穆兹的《一捆帆布》、阿尔蒙格的《植树节过后》、巴托夫的《家族的力量》、奥兹的《游牧人与蝰蛇》、奥巴斯的《猎

手涅姆罗》、沙米尔的《待到黎明时》、哈扎斯的《演说》、梅格德的《取名》等都属于这一方面。由于作家是从他们各自的感受，从他们各自接触到的生活面，去描写、去揭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使得这些作品并不局限于一个主题，而呈现出五彩景象。

《出路》是一篇描写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生活的小说。巴勒斯坦在土耳其长达四百年之久的统治下，到了19世纪末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贫穷、最荒凉的地区之一。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巴勒斯坦旅行后，把那里的景象描写为“满目荒凉”。另一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作了一次类似的旅行后，写道：“那里所有的土地一片荒凉，令人为之黯然。……这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欢乐、令人心碎的地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吐温没有描写，《出路》中却以白描的手法进行了描述：“妇女们穿着破烂的上衣，干瘪的乳房裸露在外。少女们枯皱的脸上早已失去了青春的妩媚。”“有一位约摸20岁光景的年轻妇女独自坐在树林里，与别的人隔得远远的。她赤着双脚，人看上去和她周围的干枯树枝一样细瘦。她手里抱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孩子那惨白的身体上布满了蚊虫、虱子、跳蚤和其他虫子叮咬的伤口，以及正在溃烂化脓的疮疖。”由于作者本人的悲观主义人生观给他的作品抹上了一层悲观主义色彩，作品中的人物常常表现出对生活丧失希望和信念，向着疯狂和死亡走去，不过，透过主人公帮助死亡线上挣扎的犹太难民的描写，人们似乎还是能够感受到犹太民族所具有的团结、友爱、互助的传统。

《夏末》是一篇描写20年代巴勒斯坦城市生活的作品。

一种神秘传染病的流行以及它对新兴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正常生活的影响是故事的中心内容。鉴于犹太人的独特历史经历，犹太民族历来把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放在一切之上，对死亡的威胁特别敏感，故有“每当有危险发生时，第一个逃离、最后一个回来的总是犹太人”之说。犹太人这种文化属性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中东冲突上，也是人们在试图解决这一冲突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作品笼罩着一种对疾病的恐惧，但读完之后，读者还是不难感受到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生命活力，希望继续生活下去的坚强意志和对生活的自信。此外，鲜明的地方特色使整个作品洋溢着一股浓烈的20年代巴勒斯坦城市的夏日气息。

《哈伊井》以找水为题刻画了一个为犹太民族振兴和繁荣不惜献出一切的普通犹太人。巴勒斯坦地处北半球的沙漠带，水资源历来不足，能否找到水就成了决定人们是否能在哪里生存的一个首要因素。作者以找水为线索展开故事，就使作品具有了典型性。主人公那近乎狂热的找水劲头，实际上是犹太民族振兴精神的真实写照，使人们联想到本·耶胡达在复活希伯来语一事上的狂热做法。哈伊生前为找水耗尽了一辈子的精力，死后灵魂仍不灭，仍在为找水而劳顿。作品在结尾时以托梦形式使主人公为村民找水的愿望得以实现，无疑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颂扬了犹太民族所具有的献身精神。

《一捆帆布》通过一个正统、虔诚的犹太教徒的行动准则的变化，反映了千千万万犹太教徒在涉及民族存亡兴衰问题时的心理状态。主人公卡茨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一生主张犹太民族“应该靠精神去征服，而不是用武力去征服”。

然而在历史关键时刻，却开始思考起自己到底能为“不幸的民族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来。一个走路也只是靠着墙边行的极度胆小怕事的人为了民族的利益，冒着可能被逮捕坐牢的风险，毅然决然地把象征着他唯一“财运”的帆布退还给英国当局，这样做无疑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家族的力量》是一篇反映犹太家族关系的作品。和中国人一样，犹太民族历来十分珍视家庭的友爱和家族的团结。犹太人的这种家庭观实际上反映了犹太民族所具有的巨大凝聚力。作品透过叔侄之间的不和与冲突以及问题最后的解决，反映了犹太家族的凝聚力。故事借作品人物之口说出了：“我们应认真汲取历史上的教训，圣殿之所以会被摧毁，我们之所以会被流放，原因就在于兄弟间的仇恨。”这种“覆车之鉴，不能不记”的号召是很有感召力的。

犹太民族不仅希望他的人民能保持团结，而且希望新的一代能继承老一代的优秀品质。《植树节过后》就是表达这一愿望的一部作品。以色列的植树节是悼念英烈、纪念传统的节日。通过植树的方式象征新一代对老一代开创事业的继续。故事通过描写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犹太医生的病故、其女儿对父亲的品德的了解、女儿在葬礼上用包含种子的泥土为父亲安葬，以及她亲手栽植的树苗会长出新的枝叶，暗示这种品德必将会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

揭示人的品行的作品还有《猎手涅姆罗》。佩里格少尉是师首长的副官，在他人看来他是个性格孤僻特殊的人。陪伴首长打猎使他获得了涅姆罗的浑名，这实际上是一条猎犬的名字。为了让上司开心，他还不惜降低自己的人格，跳出各种各样的舞，包括像狗一样在地上爬的猎犬舞。加上他沉默、